

主编

李匡武

副主编

周云之

周文英

中国逻辑史

现代

卷

甘肃人民出版社

中国逻辑史

(现代卷)

李匡武 主编 周云之 周文英 副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1.5 插页2 字数256,000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35

ISBN 7-226-00496-8/B·36 定价: 5.30元

朱志凱 刘培育 李匡武 陈孟麟

沈劍英 周云之 周文英

全书撰稿人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森 孙中原 朱志凱 刘培育

李元庆 何应灿 李建钊 陈正英

陈孟麟 沈劍英 张清宇 周 山

周云之 周文英 郑伟宏 欧阳中石

崔清田 高振农 高银秀 董志铁

杨俊光 葛黔君 蔡伯铭

中國邏輯史

歐陽中石題



《中國邏輯史》編輯委員會

主編

李匡武

副主編

周云之 周文英

編委

(按姓氏筆畫為序)



本卷责任编辑

周云之

本卷撰稿人

张清宇

周云之

郑伟宏

陈正英

葛黔君

杨俊光

引 言

一、现代逻辑思想发展的历史背景^①

从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是我国历史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恰好也是本卷所要论及的中国逻辑思想发展史的现代阶段。因此，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经济，特别是思想、文化发展的状况，就是现代阶段逻辑思想发展的历史背景。

大家知道，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开始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从此帝国主义的入侵、占领、瓜分、掠夺以及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革命战争与各种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中国革命开始进入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性，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却并没有使中国的面貌为之一新。面对着辛亥革命失败后的现实，一批有志于争取民主和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从1915年开始发动了一次声势很猛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这场新文化运动明确提出了要求民主和提倡科

^①本卷是讨论我国现代时期的逻辑思想，因此，卷中所用“现代逻辑思想”一词都是指的中国逻辑史现代阶段的逻辑思想，而不是指现代的数理逻辑。数理逻辑就称“数理逻辑”。

学的口号，从而有力地抨击了封建文化，促进了思想的进一步解放。

在中国工人阶级日益成长壮大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下，面对着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终于在1919年5月4日爆发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五四”运动。应当看到，“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同时也是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运动。这场新的文化革命运动更明确地提出了科学与民主的要求，极大地打击了封建文化和复古思想，从而促进了思想的解放和中国人民的新觉醒。“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正是在提倡科学和要求民主的口号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方面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一方面也为西方科学文化的进一步传入敞开了大门，同时也为深入展开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创造了条件。正是在西方科学文化（包括逻辑科学）的进一步传入和传播的影响下，中国逻辑思想的发展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复兴和发展阶段，这就开始了中国逻辑思想发展史上的现代阶段。总起来说，以“五四”运动为起点的新的文化革命运动对中国逻辑思想的发展带来了下列巨大的影响和变化。

第一，“五四”运动给西方逻辑的传入进一步敞开了大门。

尽管从明末到“五四”，已经开始了西方传统逻辑的传入阶段。而“五四”运动以后，传统逻辑的传入不仅数量有增加，更主要的是翻译出版了一些当时国外有影响的教科书。因为在当时，介绍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已经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重视。据初步调查，这一时期被翻译出版的传统逻辑著作近30种，其中属教学用书有6种以上，这就推动了国内传统逻辑的普及和教学工作。

无可否认，邀请西方学者来中国讲学，正是“五四”时期学习、传播西方文化的重要方式。1919年到1921年，美国学者杜威来中国讲学两年有余。杜威第一次向中国学者介绍了由他创立的所谓“试验论理学”，这一讲演被收集在1921年出版的《杜威三大讲演》一书中。1921年还出版了杜威的《思维术》，从此作为现代西方的一种主要逻辑派别——试验论理学被介绍到中国，对中国传统逻辑的普及和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20年，英国学者罗素来中国讲学，第一次在北京大学向中国学者介绍了数理逻辑中的命题演算和逻辑代数，这一讲演曾以“数理逻辑”为书名于1921年在中国出版，这就开始了数理逻辑在我国传入阶段。随着罗素把数理逻辑传入中国以后，我国有少数学者就开始了数理逻辑的研究并出国进修数理逻辑，从而产生了我国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数理逻辑专家。应当承认，中国的学者开始出国进修数理逻辑，不能不说与“五四”以后新文化革命思潮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事实上，向西方学习科学文化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不可阻挡的趋势。

第二，“五四”运动也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逻辑（即辩证法）^①。

“五四”运动是在一批热心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带领下，并且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是由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观察问题和指导行动的结果。所以，正是“五四”运动的爆发和发展，才真正给中国革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唯物辩证法，这无疑给中国

^①在1949年建国前的现代阶段，几乎无一例外地把辩证逻辑等同于哲学辩证法。本卷也尊重历史，在同一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而不涉及今天对辩证逻辑的不同理解和定义。

革命带来了最大的希望和光明。但是也无可否认，当时如苏联西洛可夫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1933）等，却十分明确地把逻辑等同于辩证法，并公开指责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之当然的方法论”，因此，“形式逻辑不能成为思维法则的理论”，“形式论理学是一切反动理论的方法论”等等，致使国内一些赞同、宣传唯物辩证法（或辩证法）的人也深受其影响，简单地把逻辑学等同于唯物辩证法（或辩证法），把逻辑视作世界观的一个方面（组成部分），把辩证逻辑（辩证法）当作现代逻辑发展的最高阶段，加上当时人们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对形式逻辑的误解和偏见，这就在三十年代发生了一场误把形式逻辑当作形而上学世界观的“批判”，这就是历史上被称作关于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关系的一场争论或论战。应当承认，这场“批判”对于传统逻辑的教学和普及产生了极为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第三，“五四”运动推动了中国的学术界开始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古代的名辩逻辑。

应当承认，在明末和清代，随着西方传统逻辑的传入和考据学的发展，人们已经开始重视对中国的古籍经典进行整理和校释，激起了一些学者对中国古代名辩学的关心和研究兴趣。傅山、汪中、毕沅、张惠言、俞樾、孙诒让等人先后对一批名学著作进行了整理、校勘和注解，使这些古籍成为能被人读懂之书。章太炎、梁启超等少数学者并已开始了对名辩学的研究，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研究还刚刚开始，尚未真正开展全面、系统的研究，除章太炎、梁启超在《国故论衡》与《墨子学案》中专章论述过名辩逻辑而外，再没人能写出名辩逻辑研究方面的学术专著，但毕竟打开了名辩逻辑研究的序幕。

随着新文化运动特别是“五四”运动的发展，广大学者在

“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进一步解放思想，加上西方传统逻辑的开始普及和教学，这就为总结我国名辩思潮中的逻辑成果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事实上，正是从“五四”运动开始，对中国名辩逻辑的研究才开始引起了学术界特别是逻辑学界的较为普遍的关注和重视，并真正开始了对我国古代名辩逻辑的全面、系统的研究。在短短的三十年中，不仅出版了一大批具有相当研究深度的有关名辩著作的校释本，而且这些校释本都开始比较自觉地从逻辑学的角度对中国的名辩学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和概括。更为突出的成果之一是，“五四”以后很快在我国出版了第一批有关名辩逻辑的学术专著，包括有胡适的《先秦名学史》（1922年国内出版英文原本），郭湛波的《先秦辩学史》（1932年出版）、虞愚的《中国名学》（1937年出版）和章士钊的《逻辑指要》（1943年出版）等。此外，在一批传统逻辑、哲学史、思想史等著作中也较为详细、全面地概括了中国名辩学的内容。这就使中国古代名辩逻辑的全貌开始为国内外学者所了解和承认，也为中国名辩逻辑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第四，“五四”运动以后，我国也出现了对因明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新高潮。

我国对因明（这里仅指汉传部分，藏传部分集中在第三卷中论述）的传播和研究，虽然在唐代达到过高潮，但时间很短、范围很窄，而且只限于注释方面。后来经典流失，无人过问，因明在我国几乎成了绝学。“五四”以前，由于杨文会从日本购进了在中国已经失散的玄奘、窥基等译注的因明典籍，因明研究才开始有所复苏。直到“五四”以后，学术界才有人开始对因明作全面、系统地研究，不仅出版了一些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注疏本，还出版了我国第一批系统介绍因明理论的学术专著。因明才真正由

少数佛家子弟的工具变成了学术界共同探索的知识宝库，并被当作一种专门的知识和科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和普及。

二、现代逻辑思想发展的几个主要特点及其意义

由于新文化运动和以“五四”为开端的新的文化革命运动给我国逻辑科学的发展带来了许多重要的影响，这就使我国现代逻辑思想的发展具有了下面几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数理逻辑的开始传入和传播是我国现代逻辑思想发展中最重要标志。从1920年罗素最先来我国传入数理逻辑以后，中国的少数学者就立即开始学习、研究数理逻辑，并于1927年出版了我国学者自著的第一本数理逻辑专著。约从1927年起，金岳霖最先在清华大学开设了数理逻辑课，开始系统讲授数理逻辑。尽管数理逻辑的传播和普及面还很小，专门从事数理逻辑研究和教学的人数更少，但是数理逻辑的传入和传播，确实给我国的逻辑学界输入了一种新兴的、更为严密和科学的理论体系，它代表了逻辑科学发展的新水平和新方向。因此，在三十年代发生的一场对形式逻辑“批判”的浪潮中，除极个别人外，都在事实上承认了数理逻辑的科学价值。可以说，整个数理逻辑的研究和教学几乎完全没有受到这场“批判”或“争论”的影响和干扰，显示了它在科学上和理论上的强大生命力。因此，数理逻辑的传入和传播，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国家逻辑科学的真正水平。只有认真研究和了解当时数理逻辑传入的实际情况和传播的实际水平，才能了解我国逻辑科学发展的真正水平，也才能了解我国逻辑科学落后的真正原因，才能找到我国逻辑科学发展的新的方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把数理逻辑的传入视作现代逻辑思想发展中最重要特点，正如我们把明末传统逻辑的开始传入作为中国近代逻辑思想发展的起点一样，我们把“五四”时期数理逻辑的传

入作为中国现代逻辑思想发展的起点是合乎我国逻辑思想发展的历史特点的。这说明，我国现代逻辑史之所以以“五四”为开端，并不是简单地照搬革命史的分期，而首先是以数理逻辑的传入为标志的，所以这至多只是一个偶然的巧合。

第二，传统逻辑开始进入普及阶段正是我国现代逻辑思想发展中最基本的内容。无可否认，现代阶段我国逻辑科学传播发展的基本内容还是传统逻辑，而传统逻辑在现代阶段的一个突出标志就是由传入时期开始进入了普及和教学时期。这一时期国内学者自著的传统逻辑著作大量增加，据不完全统计共有80多种，而且开始在许多大学、师范、高中等设立了逻辑课，系统讲授传统逻辑，当时出版的传统逻辑教学用书有近30种。有的著作连续出版了五次或九次，反映了传统逻辑开始进入普及、教学阶段的新形势。

随着传统逻辑的开始普及和教学，对传统逻辑的研究和争论也真正开始和深入，在许多理论问题上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和争论。包括逻辑学的定义、对象、范围；逻辑学的体系；概念的性质和分类；内涵和外延的关系；判断的性质、地位和成分；判断的分类；词项的周延关系和命题换位；假言、选言推理的性质、种类；逻辑基本规律的性质、定义、作用；归纳推理的范围、种类和形式；类比推理的性质和形式等等，对传统逻辑的深入研究和争论也是传统逻辑进入普及阶段的重要标志。可以说，当时的研究和争论已经涉及到传统逻辑的大部分领域，这些分歧和争论对当时和今天传统逻辑的普及和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以上情况表明，传统逻辑的普及、教学和争论，实际上构成了现代逻辑思想发展中最大量和最基本的内容，这无疑是现代逻辑思想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

现代逻辑史主要是传统逻辑开始在国内普及和发展的历史。这一基本的内容和特点同样反映了我国逻辑科学发展的实际水平。因此，研究现代逻辑史必须把研究当时传统逻辑的普及和教学情况作为主要的和基本的内容之一。

第三，我国三十年代发生的一场对形式逻辑（主要指传统逻辑）的“批判”，是我国现代逻辑思想发展史中一个有着深远影响的重要特征。这场“批判”主要是关于哲学辩证法和形式逻辑关系的一场争论或论战，这场“批判”的实质就是要把形式逻辑误作哲学上的形而上学世界观进行全面的批判。当时，不仅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或有些稍微知道一点唯物辩证法的人对形式逻辑横加指责，就是一些并不懂得或并不研究辩证法的形式逻辑家，为了争得讲授形式逻辑的权利，有时也不得不跟着喊几句形式逻辑确实不辩证、不全面的空话。而这场“批判”在逻辑学方面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所谓“综合逻辑”的诞生。

无可否认，这场“批判”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后果，而且在解放后直至今天，都对传统逻辑的教学和研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因此，研究我国现代逻辑思想的发展，如果不了解、不研究发生在我国三十年代的这场对形式逻辑的所谓“批判”，就失掉了现代逻辑史的一个重要内容和重要特征，也无法深入了解现代逻辑思想发展的全貌和研究现代逻辑史在今天的现实意义。

第四，全面展开对中国名辩逻辑和印度因明的系统研究，是现代逻辑史对中国逻辑史和世界逻辑史作出的最突出的贡献，也是现代逻辑史中最值得骄傲的一个特点。无可否认，中国名辩逻辑的最大成就在先秦，但是要人们（包括国内和国外的学者）承认中国名辩逻辑的成果和地位，还要靠后来的学者对中国古代名辩

逻辑的发掘和研究。正是在西方逻辑传入我国以后，中国名辩学的研究才逐步开展起来，尽管近代阶段已经揭开了对名辩逻辑研究的序幕，但只是到了现代阶段，才真正开始对中国名辩逻辑进行了全面、系统地研究，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和成果。这些成果有力地国内外学者论证了中国名辩逻辑不仅有着丰硕的内容和成就，而且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比较科学的具有中国名辩特色的逻辑学体系。尽管它在形式化方面不及西方逻辑，但它的产生却早于亚氏逻辑或与亚氏逻辑同时，因而中国的名辩逻辑无愧为世界的三大逻辑源流之一。

我国对因明学的系统研究和普及工作，实际上也开始于现代阶段，第一批系统介绍因明的专著都出版于现代阶段，这就有力地证明了中国逻辑思想的发展，不仅有土生土长的名辩逻辑学说，还包括世界三大源流之一的印度因明。由于玄奘及其弟子们对因明研究的贡献和影响，以至中国成为因明学的第二故乡。我国现代阶段逻辑思想的发展史，是真正汇集了世界的三大逻辑源流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史，实际上也为世界三大逻辑思想体系的发展作出了全面的贡献，并为三种逻辑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最好的条件。可以说，这正是中国逻辑思想发展中得天独厚的优点和特点。

总之，中国现代逻辑发展中的这几个显著特点，充分证明了研究现代逻辑史对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古代的名辩逻辑、印度因明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研究西方传统逻辑和数理逻辑在中国的传播、普及等都有着最密切的关连。也就是说，它对今天的整个逻辑学界，对于今天逻辑学的各个领域的教学和研究都有着很现实的意义。

目 录

引言

第一章 数理逻辑的开始传入和传播	(1)
第一节 数理逻辑在二十年代的开始传入和传播	(2)
第二节 数理逻辑在三、四十年代的继续传播和初步 发展	(6)
第三节 金岳霖对我国数理逻辑发展作出的贡献	(13)
第二章 传统逻辑的开始普及和争论 (上)	(26)
第一节 传统逻辑的继续传入和开始普及	(26)
第二节 在传统逻辑的普及和教学中提出的主要问题和 分歧	(35)
第三节 试验论理学在传统逻辑的普及中被传入和传播	(82)
第三章 传统逻辑的开始普及和争论 (下)	(92)
第一节 发生在我国三十年代的一场对形式逻辑的批判 和争论	(92)
第二节 综合逻辑的特点及其兴起的过程和原因	(120)
第三节 四十年代传统逻辑的进一步普及和特点	(129)
第四章 因明研究的新高潮和新成果	(133)

第一节	因明研究新高潮的出现·····	(133)
第二节	在因明基本理论研究所探讨的主要问题·····	(149)
第三节	吕澂、熊十力、陈大齐在因明研究中的主要 贡献·····	(177)
第五章	中国古代名辩逻辑研究的全面展开(上)·····	(206)
第一节	名学专著校释本的大批出版为全面研究名辩逻辑 打下了基础·····	(206)
第二节	第一批先秦逻辑史专著的出版和其它有关古代 逻辑史的专著、专论的大量发表·····	(214)
第三节	对名家逻辑思想的探讨和评价(上)——对邓 析、惠施和辩者逻辑思想的探讨·····	(225)
第四节	对名家逻辑思想的探讨和评价(下)——对公 孙龙逻辑思想的研究·····	(252)
第五节	对儒、道、法等各家逻辑思想的初步探讨·····	(278)
第六章	中国古代名辩逻辑研究的全面展开(下)——墨 辩逻辑研究的新阶段·····	(307)
第一节	关于《经》、《说》、《取》各篇的作者、体例和性 质·····	(309)
第二节	关于“辩”的定义和规律·····	(315)
第三节	关于“名”和“辞”的理论·····	(320)
第四节	关于“说”的性质、种类、规则及演绎推理的 形式·····	(329)
第五节	关于墨辩逻辑的体系、特点和估价·····	(342)

第一章

数理逻辑的开始传入和传播

数理逻辑是逻辑和数学交织的一门边缘性学科，它的逻辑方面就是现代形式逻辑。狭义数理逻辑是指用数学方法研究数学中的演绎思维和数学基础的学科。广义的数理逻辑也被称为符号逻辑，包括一切用特制符号和数学方法来研究处理演绎方法的理论。数理逻辑一开始是用数学方法研究和处理形式逻辑，后来发展到研究数学思想方法和数学基础问题，目前它很大部分内容已经成长为数学的分支。

数理逻辑在我国的历史很短。它开始传入我国，可以以1920年英国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罗素（B. Russel, 1872—1970）来我国讲学作为标志。1927年，金岳霖在清华大学开始讲授数理逻辑；同年，汪奠基（1900—1979）发表了我国第一部论及数理逻辑的专著《逻辑与数学逻辑论》。三十年代期间，金岳霖介绍数理逻辑的专著《逻辑》一书出版，在此期间发表同类专著的还有沈有乾、汪奠基和牟宗三等人。四十年代期间，沈有鼎、王宪钧、胡世华等第二代数理逻辑学者开始发表带有自己见解的科学论文。总的说来，解放前从事数理逻辑工作的人数甚少，主要集中在精力于教学；因此除了培养人才以外，科研成果很少。

解放前，做过数理逻辑的教育和研究工作的还有俞大维、肖